

书评

文学史研究的中介层次

——评“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

程凯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自开创之时起，就被要求具有相当的“史学”品质。这不仅因为其研究对象本身属于历史一部分，而且，历史研究的客观性被认为可以促使现代文学史研究避免随着文学评价标准的变迁而摇摆。但，现代文学历史性更根本的基础在于：新文学的发生、展开本身就和中国现代转型的历史过程相始终，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它构建了现代历史的自我想象和自我叙述。因此，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与如何理解、叙述中国现代转型的历史过程有着深层次的纠缠。就此而言，文学史的“历史客观性”不是追求剥离开“意识”的“外衣”而呈现历史“事实”的“硬核”，而是需要直面当事人的历史意识、自我意识中蕴涵的历史线索和历史可能性，并把处理这种意识与现实条件之间的错综关系作为基本的出发点。这使得以文学为基点的历史研究面临更艰巨的方法论挑战，也就是同时构建对文学与历史新的、双重的想象力。

近年来，随着文学史研究日渐“价值中立”化，现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品质越来越成为一个在研究方法层面操作的问题。事实上，如今，现代文学研究受历史学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强调“实证”，强调史料挖掘等已成为学科基本要求。如果说80年代一些研究成果往往受到新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诸如新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符号学、神话学等等——的启发，那么，近些年的研究趋势则越来越受到地域研究、都市研究、文化史、社会史等史学新方法的影响。同时，不同研究领域视野的融合也产生了像“文化研究”这样的跨学科研究方法。相比之前单纯注重作家与省市关系的地域文学研究和以区域经济、政治状况为核心的地方史研究，今天新的地域、都市研究已经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正像陈平原教授为“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所撰写的《总序》中指出的，新的都市研究应该是“城市历史与文学想象的混合物”，研究者“关注的不是区域

文化，而是都市生活；不是纯粹的史地或经济，而是城与人的关系。”这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既是对史学的挑战，也是对文学研究的挑战。

由陈平原教授主编的“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出版）力图促进这种新的都市文化研究。第一批推出的专著共有四本，包括：杨早《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葛飞《戏剧、革命与都市漩涡——1930年代左翼剧运、剧人在上海》、凌云岚《五四前后湖南的文化氛围与新文学》、颜浩《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文人团体：1920—1928》。它们都是由作者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分别涉及现代文学的一些重要区域，像北京、上海、湖南等。但，有意思的是，仔细阅读会发现，在这几本专著中，北京、上海、湖南这些空间、地域的限定不是一种前提性的设定而是作为一个历史因素存在的。换句话说，作者并不是为了研究某个地域而确定其论题。事实上，每一个空间限定都配合着相应的时间限定和问题限定，其背后更根本的问题指向则是回应现代文学历史脉络中一些关键性环节。比如，杨早选择清末民初的北京是意在考察新文化运动登场的历史脉络，它和清末民初市民启蒙运动的关系；葛飞考察30年代的上海为了揭示左翼戏剧存在的“外部情境逻辑”，还原左翼文化的历史形态；凌云岚关注五四前后的湖南意在呈现新文化运动的实际影响和历史条件；颜浩瞩目20年代的北京则是为了追踪五四运动落潮之后北京知识界的分化和转变过程。因此，地域的限定是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历史情境而不是独立的考察对象。这就使得这些研究延续着现代文学的内在历史脉络而避免用外在的问题框架对历史对象进行切割和宰制。

既然这里的都市、地域是历史性因素，空间就不仅仅是物质性的存在，也不止是想象的对象。实际上，在这几本专著中对物质性的都市空间的涉及较少，它们真正关注的是社会性的都市空间，也就是与“公共空间”等社会性存在密切相关的那一部分抽象的“都市空间”。几本书中都普遍涉及对舆论空间、学校空间、表演空间等都市公共空间构造形态的历史考察。这些部分甚至一定程度上构成研究的主体。可以看出，几位作者力图从物质构成到运行机制到言论话题，对产生新文化的公共空间环境进行全方位的历史还原。在相关社会史、文化史资料较为匮乏的情况下，这种还原只能依靠研究者大量翻阅旧期刊和原始资料来加以钩沉。由此而构成的一些文化史考察可以说是具有开创性的。像杨早对民初北京“阅报处”、“讲报所”设立过程、分布情况、社会效果、历史演进的考察；葛飞对30年代左翼戏剧主要演出场所——“游艺会”的描述，对左翼戏剧“演剧史”的详细考辨，都兼具史料价值和方法意义。因为这些“场所”的产生和存在状态不仅是提供一个文化传播的空间，它们自身的形态就左右着人们接受其内

容的方式和效果，它们虽然是空间性的，却是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从这些“有意味的空间”入手人们可以把握一些以往被忽略或掩盖的历史逻辑。

而且考察这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场所是准确地把握其所在都市社会与文化结构特征的很好出发点。杨早曾在文中分析为何“阅报处”、“讲报所”得以在北京流行却在上海难以成立。其中谈到上海作为典型的移民社会难以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本土下层社会和稳固的底层文化。“在一个商业化成分较重的社会里，缺乏经费的启蒙知识分子想大量设置阅报处、贴报处也远比北方困难。办报之外的多种启蒙手段难于在上海推行，办报的启蒙者也就很难真实感到下层社会读者的存在，并与他们交流、互动。”（《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第57页）由此造成上海的启蒙性报纸多将眼光上调到绅商和学生群体。而北京虽然原本是科层制度严格的社会，但经历庚子事变之后，社会等级被打乱，社会启蒙的急迫性也凸现出来，再加上“京话”的优势地位，使得清末民初北京的舆论空间呈现出“报纸与社会运动结合”、面向下层社会的时代特征。而“讲报所”、“演说会”等宣讲场所的出现既是这一历史动态的产物，也为这股社会化的启蒙潮流注入新的变形因素，使它变得难以被启蒙者完全控制，呈现出复杂的历史形态。在这里，对都市场所的解读和对都市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的解读相互激发共同构成描述、分析清末民初北京社会启蒙运动形态的有效切入点。

而葛飞对左翼戏剧所依存的演出空间的考察同样具有超出戏剧史范畴的视野，它实际上是从戏剧生存形态切入，进一步拓展为对30年代上海都市社会、文化生态的概括性把握。作者将30年代上海的文化状态概括为一种“多元消极共存的‘都市马赛克’”。也就是多种艺术风格、生存形态、意识形态诉求、政治倾向杂糅并置在同一个空间之中，表面互不相干，暗地里诸多资源、板块相互撞击、相互缝合、相互借力，共同构成一副历史拼图。“游艺会演出”是这种“都市马赛克”形态典型的代表：演讲终了歌舞起，京剧唱罢话剧登场，再加上游艺、杂耍，共同构成了当时上海最常见的演出类型。左翼戏剧常常要在这种众声喧哗的场景中争夺自己的一块演出之地。尽管左翼文化人力图在多元共存的文化环境中创造一种主导性、排他性的文化立场，但现实环境决定了它只能首先接受这样的生存条件，其次再依据时势的变化发挥自己主动的影响。而不可挣脱的是，它所身处的背景环境不自主地影响着它的被接受状况，也影响着它的创作资源和创作立场。作者在文中专门讨论了左翼戏剧面对自身激进意识形态所造成的“剧荒”，如何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式，吸纳市民趣味，实现左翼戏剧的“大众化”。事实上，只有还原左翼戏剧存在的历史中介层次——它们的演剧史、剧场史，我们才能摆脱单纯依靠左翼剧人“后设”的自我陈述所建立起来的历史叙

述，真实呈现左翼戏剧当年面对的真实问题和困境，考察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过程，并以此为基础重新定位左翼戏剧的历史位置和作用，重新建立关于左翼戏剧的历史叙述。在书中，作者几乎讨论每一部剧作时都不会视其为孤立的“创作”，而是将其放置在戏剧当时面临的内部、外部困境中，看剧作者、演出者如何在创作中回应这些问题。正如作者在书中展示的，“都市马赛克”的形态不仅存在于空间上，它更是各种思想形态、艺术形态杂糅并置的象征性表达：

就上海的“世界主义”而言，《怒吼吧，中国！》等苏联戏剧，从东京传到上海再“转口”中国内地。另一方面，演员们又去观摩西片模拟好莱坞演技，来表现苏俄剧本，或表演中国工农大众。而在日常生活中，青年女工也是既追求进步，又追赶时髦。上海摩登或者是对源头不一的现代文化的多重模仿？我们还会看到，左翼戏剧进入市场后，以《赛金花》、《春风秋雨》为代表的政治通俗剧，与文明戏相互缝合。左翼剧人居然与基督教青年会相互借力，到工厂区活动。问题总是多向互动的。

这种30年代上海特殊的、“多向互动”的“现代性”是左翼戏剧生存、创作的基本“语境”。同时，通过对左翼戏剧的历史还原正可以有效地呈现上海30年代都市“现代性”的复杂面貌，并重新组合左翼戏剧的历史发展脉络。

除了那些“有意味”的都市空间，几位研究者更加关注的还有都市中的舆论环境、言论空间。近些年，随着现代文学的研究对象从以作品为中心转移到文化生产环境的考察，报纸、期刊研究得到越来越深入的拓展。而对都市文化而言，报刊、杂志不仅构成都市公共空间的核心而且起到串连、组织都市各个社会空间和社会群体的作用。因此，都市、地域文化研究中的报刊、杂志研究不仅要关注它们和言论的关系，更需要注重报刊自身的构成方式、定位，它的社会组织功能，它和其他社会空间的关系等问题。《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就集中考察了晚清民初北京的各党派政治势力、知识分子如何看待“言论”的作用，并努力打造各自的言论场所。无论是《京话日报》、《顺天时报》还是《甲寅》、《新青年》都有着自己特殊的定位，针对特殊的读者群。其背后的历史脉络是不同报刊作为公共言论工具或党派舆论机构的功能化变迁，它们如何在上层社会与中下层社会之间寻求自己的生存空间。而它们共同面对的问题是“启蒙”这一使命的不同进路与姿态，以及带来的不同效果与利弊。从面向中下层民众到面向学生社会“新青年”，从启蒙民众到与传统上层文化抗衡，从思想、文化转向政治、舆论。这一系列发生在不同言论空间中的变化最终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登场”。这是从舆论史入手对思想史问题的重新书写。

而凌云岚的《五四前后湖南的文化氛围与新文学》则“试图通过对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书写，来展示社会整体结构中各子系统与文学之间产生的种种互动”。这里的“文学”其实不再是作为个人创作成果的作品，而是“舆论”的一种，甚至是比一般新闻报导更集中、凝练的社会性书写。因此作者关注的是当时在舆论界引起广泛关注的种种政治、社会现象如何进入到文学书写之中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看出，作者尝试着通过提炼文学文本中的意象或主题，展示历史、文化等诸多人文因素与文学创作之间的“互文”，力图将相关历史背景、新闻事件、文学创作及作家生活经历以“拼图”的方式组合在一起，从而展示出文学创作与文化结构中其他因素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样一种视野下，五四前后湖南的教育、传媒、女权运动、地方自治运动和历次“革命”（从“辛亥革命”到“大革命”），都成为作者关注的对象。换句话说，是什么样的区域文化背景中产生了这样的文学，文学作为社会象征表意系统又怎样参与区域文化的建构，并以自己的方式讲述、想象、建构这个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成为作者的问题出发点。在这样的研究视野中，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些遭“忽略”的问题得到再次“照亮”。作为历来被视为“中省”的湖南，它与北京、上海等新文化和新文学的中心城市之间曾经以何种方式进行文化交流，这种交流究竟是多数人想象中的“影响—接受”这样一重简单关系，还是隐藏着更多可以去进行发掘的问题，作者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作为研究对象的湖南，在这种“影响—接受”关系中，无疑展现出了相当大的能动性，本地的文化氛围决定了哪些文化因素在传入本地的过程中会受到更多地关注和放大，并反过来作用于中心城市乃至全国的文化氛围。

相比之下，颜浩的《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文人团体：1920—1928》所关注的舆论层次更集中：主要是以《语丝》和《现代评论》为代表的20年代中后期北京新文化知识界的舆论状况。事实上，考察舆论环境十分有效的方法是结合事件和论争考察、分析不同的舆论立场，进而追踪其背景、脉络。颜浩对20年代初北京“后五四”时期新文化群体言论立场的考察就是借助三个社会事件——邓春兰投书北大开女禁、李超之死、林德扬自杀——的讨论贯穿而成。而对于20年代中期开始北京新文化群体分化的历史过程则是借助考察《语丝》和《现代评论》两个代表性刊物的成刊过程以及围绕“女师大风波”、“三一八惨案”等一系列事件所展开的论争来加以描述的。在这些舆论分歧的背后，作者进一步关注的是在这一过渡时期新文化群体的分化和文人集团的重组，因为这预示着下一时期新文化形态的转变。

事实上，这四本专著在研究的时段上有一定的承接性。因此，合在一起恰

好可以构成从新文化运动发生到30年代左翼文学时代新文化运动所依托的舆论空间、社会空间、思想命题、文化形态的变迁史。同时，各书设定的一些问题也有许多可以相互呼应的地方。像凌云岚和颜浩都以个案分析的方式讨论到新文化的妇女解放运动所引发的社会事件和舆论反响。分别发生于北京和湖南的两个自杀案例在当时的言论界引发了彼此呼应的讨论。而杨早关于清末民初北京白话报刊的讨论和葛飞关于30年代上海左翼戏剧生存状况的讨论中都涉及一个核心问题——启蒙与民众的关系。无论是清末遭遇离乱的读书人还是30年代革命者都感觉到面向民众进行启蒙的急迫性，他们的办报与演剧实践也都是以启发、召唤民众为目的，从而带有社会运动的性质。但当启蒙理想与真实的民众相碰撞时，启蒙者都面临着思想传播过程中不受控制的状态，同时意识到思想的传播会大大受限于传播的途径和接受者的现状，因此需要不断调整、利用、妥协。实际上，通过研究者努力还原历史状况，我们可以从启蒙面对民众所遭遇的尴尬和持续摸索有效传播途径的历程中清晰地看出启蒙不仅是一套思想，它在付诸实施时必须构造一套相应的体制中介作为依托。而这套体制要想有效运行就必须和周围环境、民众状况发生纠缠、争夺、融合。所以，理想性的启蒙在现实中不可避免地会变形而不可能保持理想状态。这是启蒙的真实处境，也是启蒙者必须面对和正面处理的问题。清末民初的启蒙由面向下层社会的初衷发展到面向学生社会、知识阶层的新文化运动，期间就经历了启蒙的历史变形。而30年代的左翼剧人挣扎在“革命超我”与“名利场逻辑”的张力之中，一方面与市民趣味妥协创作通俗政治剧，一方面不放弃“到民间去”的理想，在和“落后”现实的碰撞中不断摸索、调试自己的创作方式。这些叙述线索中呈现着一些关键的历史感觉，从中其实可以生发出更内在于现代文学和历史的问题脉络、叙述路径。

虽然以上四本专著是以“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的名目出版，但它们显然不单纯属于都市文化研究的领域，而都有着融会文学史、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舆论史于论题之中的抱负。而且它们也确实做到了将各种研究视野有效组合形成新的研究视角。更为有益的是，它们通过凸现对历史中介因素——社会空间、话语机制——的考察不仅丰富、细化了历史理解，而且寻觅出一些新的历史线索和问题。这些问题和线索将有很强的沿展性，而所采用的方法也会在问题的进一步拓展中变得更加成型、完善。

[程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邮编 100732]